

第一章 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地理条件

地理环境对旅外商帮兴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地理位置的区位优势与交通条件、人口状况，特别是一定区域内耕地与人口的关系等。

从地理区位优势看，明初基本拓定的浙江省域 介于东经 118°至 123°与北纬 27°至 31°间 北接上海、江苏 南邻福建 西联江西、安徽。浙江的气候具有冬夏季风交替显著、四季分明、热量资源丰富、雨量充沛、空气湿润等特点 特别有利于需要热量和水的水稻生长 也适宜于桑、茶、麻、竹、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浙江陆地地形概而论之分为两大类：一是平原区，主要包括浙西杭嘉湖地区和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以及椒黄、温瑞平原，这里历史时期就是浙江主要商品粮基地和蚕桑、棉花、茶叶、烟草、黄麻等重要经济作物区；二是山地丘陵区。浙东除宁绍地区北部外皆为丘陵山地，浙西天目山、莫干山区各县也多为山地，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7/10。这些地区除产稻米外，盛产茶叶、棉花、蚕桑、竹目、靛青、烟草、柑橘等经济作物。浙江东濒辽阔东海，是个海洋“大省”，全省大陆海岸线

1840 公里 海岛海岸线 4301 公里 沿海岛屿 2100 余个。滨海的自然环境不仅为浙江带来极其丰富的海产渔业资源和盐业资源,也铸就人们冒险、开拓、生来爱好向外发展的习性。

就交通条件而言,浙江在前近代时期水陆交通就已十分便捷。水运方面,钱塘江干流及支流新安江、金华江、浦阳江水系与浙东 杭甬 运河及曹娥江、奉化江等构成航道网,与以杭州、湖州、嘉兴为支点的内河湖泊航运网联成一体,构成便捷的水运体系。杭州为南北水运大动脉大运河南端终点,大运河不但把浙江与当时南北商路东干线各城镇相连,并与东西商路中线长江水道相接,在临清与东西商路北线衔接,在北京又与东西向商路干线最北端边路沟通^②。海运方面,浙江海岸线漫长,多良港海湾,又地处南北洋航路中端,海运便利。前近代时期,虽因海禁关系,海运时盛时衰,但海运商路已十分发达,宁波、温州、杭州 清乾隆年间因钱塘江改走北大门入海后丧失海运条件)乍浦、定海、澈浦等都是主要海运港。明代时这些港口大多已开辟至南洋各地、日本、朝鲜等海外贸易航线,清初又开辟北洋航线,并在营口与辽河联运,与东北商路网衔接。宁波海道辐辏,“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放船长驱,一举而千里”^③是最重要的海港。“肩挑沪杭,背负太湖”的乍浦也是东南著名海港^④。陆路交通方面,早在宋元时期浙江就已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主要有杭州经嘉兴或湖州,过平望与苏州及长江商路相连,或在湖州经南京接长江水运;杭州经建德、衢州,经山西出江西玉山或经江山出仙霞岭接福建 连赣江——大庾岭著名商路^⑤ 杭州经建德、金华、丽水西南接福建,或再由丽水经温州南接福州;杭州经绍兴、台州接温州 杭州经绍兴至宁波,宁波经台州至温州、丽水 绍兴至金华等要道。明清时期,浙江陆路交通更为发达^⑥。便捷的交

通为货物运销和浙江商帮的兴起创造了便利条件。

人口状况、特别是一定区域内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是前近代浙江商帮兴起的基本原因。为了能较清楚地说明问题，笔者把清代（至 19 世纪中叶）浙江人口与耕地关系列成表 1-1。从表中可以看出：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浙江共有人丁 272 万，耕地 4522.2 万亩，每丁拥有耕地 16.6 亩，如以丁占人口的 60% 计算，则总人口为 435.2 万，每人有耕地 10.38 亩。乾隆十八年（1753 年）人口增至 866.3 万，在近百年时间里人口缓慢增长近 1 倍，每人拥有耕地降至 5.34 亩。至咸丰元年（1851 年）浙江人口猛增至 3010 万，不足百年人口增长 2.48 倍，使人均耕地降至 1.5 亩^⑦。而据学者研究：按明清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大致每人平均 4 亩耕地方能维持基本生活^⑧。鸦片战争前后的浙江显然远没达到这一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上列人口统计是据清代官署所载资料，由于缺乏科学的统计设备与统计制度，加上人口的自然和人为变动，民间户口的故意归并，地方豪绅的荫庇，官员的舞弊隐漏等，实际户口数肯定要大于在册户口数，则浙江实际人口密度更高，人均耕地还要少，可见人地矛盾是十分突出的。

表 1-1 清代浙江人均耕地变化情况

顺治十八年(1661)	272 万丁	4522.2 万亩	每丁 16.6 亩
雍正二年(1724)	275.9 万丁	4588.5	16.3
乾隆十八年(1753)	866.3 万人	4625.8 *	5.34
乾隆五十一年(1786)	2147.3	4649.8 *	2.17
嘉靖二十四年(1819)	2731.3	4649.9 *	1.7
咸丰元年(1851)	3010.74	6412	1.5

资料来源：据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第 34 页表改制（台湾永裕印刷厂 1985 年 5 月），有 * 者系笔者据该表所列数据的年均增长率算出。

以上还只是从全省范围来考察人均人地关系，事实上浙江各地又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地区这一矛盾还要尖锐得多。比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浙江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0.7人，但嘉兴府高达每平方公里719.3人，绍兴、宁波、杭州都超过500人，湖州也达475人^⑨。而其中宁、绍、湖诸府总体上以山地居多，这样人地矛盾更为突出，粮食远不能自给，宁波就有“七县熟，一席粥”之称。

人口增长造成人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矛盾日益突出，迫使许多浙江人不得不离开世辈居住的乡土，外出经商谋生。我们从各种方志、碑刻等资料中可以发现大量这类记载。如“宁波之为郡，背山面海，地狭人稠，往往外出贸易，兼营航海之利。风帆浪舶，北之辽沈，南迄闽广，中人长江，而以上海为集市居货之地”。^⑩宁波因“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⑪“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十一之利”。^⑫绍兴“素称泽国，多谋食于他邦，由是童而习业，壮而远游”。^⑬金华号小邹鲁，处浙东偏，地瘠人稠，远服贾者，居三之一。每岁樯帆所元，络绎不绝。^⑭衢州人因“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驰骛奔走，竞习为商，商日益众”。^⑮宁波府奉化县因“右山左海，土狭民稠，[民]旧以开辟为事”^⑯；该府定海县也是“其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镜境处丛山中又硗瘠少水，俱不适种植，以故禾稼所出岁不足以自贍”，乡民多迫于生计而流往外埠经商^⑰。

二、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人和商帮兴起的物质基础。浙江的

商品经济素称发达，前近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主要表现在农业中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水产品及城乡手工业商品化的提高。

浙江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但直至元代，各地普遍仍以粮食作物为农业主要经营方式。前近代时期，这种传统经营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日广，并形成诸多专业性种植区域。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区，其中又以湖州最盛，嘉兴、杭州依次之。湖州在明中叶已遍地树桑，“尺寸之堤必树以桑；环渚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⑧。清代更是“比户养蚕”^⑨；“舍南舍北皆栽桑，千株万株绕屋旁”，甚至低洼之地也“填土种桑”^⑩。嘉兴府属 7 县，以“石门、桐乡育蚕最多，次则海盐，又次嘉兴、秀水、嘉善、平湖”^⑪。杭州府属 9 县也都植桑，“沿山之田民多种桑”及“桑麻遍野”的记载就是其写照^⑫。总之，清代“杭、嘉、湖三府属地方，……民间多以养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⑬。全省“蚕桑之利甲于天下”^⑭。

入明以后，浙江棉花种植渐广，主要集中于宁绍平原。由于清乾隆后钱塘江改走北大门入海，南岸沙地不断向北扩展，棉花种植随之迅速发展，并在清中晚期达于全盛。此外，嘉兴府海盐、平湖，温州府永嘉等县植棉也较广。棉花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余姚县志》卷六“物产”说：“姚邑北乡沿海百四十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计，邑民资以生者十之七八”从而在沿海形成安昌、曹娥、三江等以棉花交易为主的集镇。

茶叶是商品化最高的经济作物之一，浙江在唐代产茶区已有 50 余县，明清时植茶更趋于鼎盛，全省 11 府 70 多个县

中种植茶叶的达 60 余县，并产生二三十种全国名茶。种制茶业成为不少县民生之源，如于潜县民“仰食于茶者十之七”^②。所产茶叶除在省内外销售外，还大量出口，“绍兴茶输到美利坚，宁波茶输到日本”^③，当然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如绍兴平水珠茶在 18 世纪初就风靡伦敦市场^④。

麻的种植也很广，浙北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是相对集中的地区。所以文献记载往往“桑麻”并提。如前述湖州“桑麻万顷”杭州“桑麻遍野”即是。其他如温州、衢州等都有种植，如衢州府常山县康熙中叶“开山种麻，不数年，几遍四境”^⑤。此外柑橘、烟草、甘蔗、颜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如“衢州橘林，傍河十数里不绝”^⑥，宁波“甘蔗所在皆植”^⑦。

前近代时期，浙江商品性手工业高度发达，城乡手工业商品化生产和商品流通扩大，形成不少产品行销全国各地的著名的手工业集中生产区域。如“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⑧。

缫丝、丝织是当时最主要的手工业，杭嘉湖地区不但是浙江也是全国丝业生产和交换中心。杭州不但官营丝织业发达，年产上等绸缎居江南三织造局之首，而且民间丝织业极盛。清初杭州东城一带“数万千家之男女”操丝织业，“机杼之声，比户相闻”^⑨。杭州绸缎“织纤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⑩。湖州则是丝业生产和交换更集中的地区。我们在明清史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胡丝）合郡俱有，而独盛于归安，湖丝遍天下”湖州“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这样的记载^⑪。嘉兴虽然“蚕丝之利亚于湖州”，但所领 7 县也都兴蚕丝之利^⑫，而且颇为发达。如濮院镇，明中叶时“委巷之中，接屋连

檐机声盈耳”^③。清康熙间仍是“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绢帛为生”^④。

棉纺业主要集中在浙西杭嘉湖和浙东宁绍台地区，无论乡村、城镇，几乎是家家户户习为恒业。如嘉善“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也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男妇或通宵不寐，……其衣食全赖于此”^⑤。平湖县也是“比户勤纺织”^⑥。就是手工缫丝中心南浔，也是“摧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棉与布交易而退”^⑦。村民纺织已纳入商品流通。

酿造业也甚发达，酿酒中心绍兴的酿造作业已开始向大工场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大酿坊，如创设于明代的孝贞、叶万源、田德润等酒坊，创设于清代的王宝和、沈永和、章东明、越明、善元泰、茅万茂、蔡忠义等酒坊。这些酿坊资金和技术较为雄厚，作场广阔，并有专门的推销员。绍酒的专业化、商品化程度很高，其酿造原料糯米绍兴本地所产远不足供应，多仰赖江苏无锡、松江等地；其产品早在清初就行销全国各地，有“越酒行天下”^⑧之说。清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又说，“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抗衡”^⑨。

浙江也是前近代全国纸张重要产地。嘉靖时，浙江的贡纸就有6种。衢州是浙江竹纸主要产地，该府的常山、江山、开化、龙游等县多经营纸业，“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⑩。杭州造纸也很普遍，杭之富阳是有名的草纸产地，“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小勤作，昼夜不休”^⑪。当然产纸区域远不限于衢

州、杭州 据成书于 1930 年的《浙江之纸业》调查统计 历史上浙江产纸区包括 11 府的 53 个县 纸产品达 90 余种^④。

浙江还是全国著名产盐区。盐区范围以余姚岱山一带为中心，北起浙西平湖白沙湾，循沿海各县滨海地直至浙南平阳熬江口，绵延千余里，其间盐场林立，明代浙江有盐场 38 处，规定年产额 667135 余引（每引 200 斤）^⑤。清代虽有裁并，尚有 31 场。清代直至民初，规定浙盐的行销区域除浙江全省外 还包括江苏长江以南的苏、松、太、常、镇五府及安徽徽州、广德和江西广信一带。当时最主要的盐场浙东盐场所产的盐，除招商运销浙江各府外，或通过海运运至上海，再由上海转运江苏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地 或海运渡杭州湾至盐官，转运嘉兴、湖州及安徽徽州、广德等地；或通过陆路、内河河运，至安徽徽州、广德及江西广信等州县^⑥。

冶炼、织席、榨油、竹编、草编等商品性手工业在前近代时也发展起来。嘉兴府炉头镇是浙江最大的专业化冶铁基地，其“居民以冶铸为业 炉火不绝 镇由是名”所产釜钟鼎鼐等产品行销大江南北^⑦，是江南铁制品制造和销售中心。鄞县“多种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计所赢优于农产”^⑧。手工榨油业以石门镇为中心，镇上作坊与工场达 20 余家，以生产城乡居民食用油、照明油为主 产品有豆油、麻油、柏油等 大量销往外地^⑨。竹乡安吉，农家副业生产“竹器十居八九”^⑩。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把广大的小生产者纳入市场网络中，而且为商人的贸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大批乡农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工商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 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⑪。在许多城镇，这样的工商者占人口的半数以上。如南浔：“镇上大半衣食于此（经营生丝买卖）”其

四周乡村也是“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③，双林镇“衣食于贸易者，十居五焉”^④。塘栖镇“户肆鳞集，多世族商民”^⑤。去农经商者中许多又脱籍贸迁于外，不但省内跨地区经商，跨省经商也已十分普遍。清嘉靖年间，人称浙江宁、绍、金、衢诸郡之民“半游食于四方”^⑥。

这些跨地区经营的浙商，开始在客居地设立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公所。结帮经商，浙江商帮开始兴起。如在北京，宁波府药材商在明末就集资建造了鄞县会馆；清初宁波慈溪成衣行商人又在商业繁盛的前门外创设成衣行会馆^⑦。绍兴钱商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京创办“正乙祠”，即银号会馆^⑧。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宁波商人为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立了浙宁公所^⑨。在东南商业中心苏州，杭州杭线业商人在乾隆初年创立“规模宏大”的武林杭线会馆。杭州绸商、锡箔商也附于内^⑩；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杭州绸商另立钱江会馆，“凡为楹者计一百三十有奇，垣墉高而瓴甓坚，堂构焕而栋宇壮。”是苏州最具规模的同业兼同乡会馆^⑪；乾隆十七年（1752年）金华府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贸迁于苏者创建金华会馆^⑫。湖州绉、绸两业商人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创建吴兴会馆，作为两业集议之所^⑬；绍兴蜡烛商也于道光二年（1822年）捐资共建东越会馆^⑭；浙南温州府各县纸商则在城南建有浙南公所^⑮。在常熟，宁绍商人于乾隆三十年（1771年）集资置地设立了义冢所，嘉靖初年（1800年）又捐资兴建宁绍会馆^⑯。在长江上游重镇重庆，主要从事磁货和其他杂货业的浙江商人于嘉庆六年（1801年）集资设立了浙江会馆^⑰。甚至在偏僻的甘肃兰州府皋兰县，浙江商人也于道光中叶设立了浙江会馆^⑱。

与此同时，浙江商人开始在上海兴起。上海居长江三角洲东端，处中国海岸线中点，扼万里长江出海口，有广阔富饶的长江流域为经济腹地，具有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自南宋末上海建镇后，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明中叶时，因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高度发展，上海已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吞吐港。至嘉庆年间，上海已是“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之地了^⑧。道光初漕粮开始海运后，黄浦江上漕船“各郡并集，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无际”，上海又成了江南漕粮转运中心，在东南沿海城镇格局中地位日显重要。浙江毗邻上海，与上海交通便捷，浙东宁绍地区与上海仅一苇之航，浙西杭、嘉、湖地区也有密集的水道与之相通。所以在前近代，上海已是浙商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其中又以宁绍商人为主。

绍兴商人在上海主要从事锡箔业、绍酒业、柴炭业、钱庄业、豆业、染坊等业。明代绍兴已成为锡箔主要产区，其产品箔块等主要销于上海、杭州等地箔庄，绍兴锡箔商随之活跃上海。绍兴商人在上海经营柴炭业至少在清雍正之前，雍正、乾隆年间，绍兴柴炭店开始兼营货币存放业务，是为上海钱庄之嚆矢^⑨。清乾隆初年（约1737年左右）浙绍炭业、钱业和豆业绅商在上海创建浙绍公所^⑩，这是上海设立最早的同乡组织之一，它的设立标志着旅沪绍兴商帮的形成^⑪。以后绍商在上海经营的行业有所扩展，队伍也不断壮大。乾隆年间，绍兴各大酒坊开始在上海开设行号，首开其端的是著名酒坊王宝和（设于乾隆九年^⑫）。至19世纪初，绍兴帮已成为上海最具势力的帮口之一，他们基本上掌握了百业枢纽的钱庄业，以至钱业公所邑庙成了浙绍各业遇事公议的场所^⑬。成碑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浙绍公所捐置义地姓氏碑》为我们提供

了当时旅沪绍兴商帮势力的想象空间，该碑登录的浙商捐资行业有浙绍豆业、浙绍钱业、浙绍炭业等，浙商个人或堂号捐资的多达 210 余家^⑭。

宁波商人至少在明代就旅沪经商，《上海四明公所缘起》说，“盖甬人之旅沪，自明至清数百年于兹矣”^⑮。甬商在上海主要经营航运（沙船）、南北货、杂粮、民信业、海货、银楼、酱园、钱庄及营造等业。清嘉庆三年（1798 年），宁波旅沪商人便在上海北门外（今人民路大境中学附近）购地 30 余亩建成寄柩殡舍，而以余地为义冢。嘉庆八年（1803 年）又扩建正殿，正式建立四明公所^⑯，这可以看作是旅沪宁波商帮形成的标志^⑰。不久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之宁波号商、船主又集资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⑱。嘉道年间，更有大批宁波商人到上海经商创业，后成为著名商业世家的方氏、李氏、董氏等家族，此间都纷纷到上海谋发展。镇海方家的开创者方建康（1772—1840）在 18 世纪末“子身至申江，典衣被为资肆市廛，……积数年始营立贾店”^⑲。开设方泰和糖行，兼营南北货，不久又召同祖以下昆季赴沪。其弟方介堂（1789—1833）约在 19 世纪初开始经商，先在镇海开设粮食行及杂货店^⑳。稍有积蓄后从兄转上海，开设方义和糖行，经营食糖买卖，兼营粮食、南北货，因经营繁忙，就召族内子侄方润斋、方性斋等多人至沪协助经营。他的二弟方简裁也“弃儒服贾申江，业日以起”^㉑。1830 年前后，简裁之子润斋和性斋在上海设立南履和钱庄，开始向钱业拓展，润斋又和其弟梦香设立振裕丝号。镇海李家经商上海稍晚于方家，1822 年，李家开创者李也亭到上海南市码头曹德大漕坊当学徒，四五年后转业到沙船任职，不久就开设久大沙船号。约 19 世纪初，慈溪董家创业者董棣林也开始从贾沪上，他往来东北、上海从事参药业，积累了一些资

财，为董家在上海商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②。道光前期，上海已出现以宁绍商人为主的同业组织，如道光三年（1823年），宁绍地区的水木作业匠在上海创设同业组织水木业公所（鲁班殿）；浙江旅沪粮商也在道光年间成立米麦杂粮业公所（仁谷堂^③），说明这些行业都已颇具规模。

总之，随着前近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上海在东南沿海城镇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宁绍帮为主的浙江商人开始在上海兴起，这为近代浙江商帮在上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历史契机

如前所述，随着前近代时期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商帮已开始在上海兴起，但浙江商帮大规模崛起上海，并在上海近代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则如同上海本身的崛起一样，是以上海开埠为契机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口；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为通商口岸。由于上海具有前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开埠后，中国内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和沿海邻近地区的出口商品不再南下广州出口，而是通过水路如“百川归流”纳于上海。如湖州的丝绸在公行制度时期多由闽粤及湖州本地商人运至广州经公行售于洋商，上海开埠后“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④；江西、福建甚至浙江的茶叶在上海开埠前都西入鄱阳湖经赣江越大庾岭南下广州出口^⑤，上海开埠后，这些地区出口茶叶开始分流，有的改为东向经钱塘江水系经杭州或宁波运往上海。通常是今上饶地区及武夷山南麓所产茶叶在信江边河口镇集散，经河口—玉山—常山—杭州至上海；皖南茶区的茶叶在屯溪集散，

经新安江“运至杭州转往上海”^⑥，不少茶商为了躲避苛捐杂税，将茶叶运抵杭州城外义桥后不入运河抵上海，而是东向经宁波转海路运上海^⑦。进口商品也多以上海为集散地，使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中国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移向上海。自1843年上海开埠到19世纪40年代末，虽然广州仍是对外贸易中心，但它的贸易绝对值在下降，而上海却在上升。从1845—1850年，广州输出的茶叶由7639万磅下降到5508万磅，生丝由6787包下降到4305包，而同期上海茶叶输出由380万磅上升至2236万磅，生丝由6433包升至17245包。（见表1—2）至50年代，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从出口方面看：出口大宗茶叶，1844年从上海输出的仅占全国出口数的2%，1850年就增长到29%，1953年增至69%；生丝出口，1845年广州略大于上海，但到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已占全国生丝出口的90%左右。1867年，包括丝茶在内的全部出口，上海一口就达3600多万海关两，差不多是广州的4倍^⑧。进口方面，1844年上海的英国粗哔叽进口只是广州的1/3，1855年上海已是广州的一倍多，至1863年则几乎全部集中上海^⑨。1869年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已是广州的9倍^⑩。情况确如马克思1858年说的：“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移到上海。”^⑪

上海开埠也削弱了宁波、乍浦的外贸地位。宁波、乍浦在鸦片战争前曾是盛于上海的东方大港。如宁波，西方人描绘过她的繁荣：“其房屋建筑得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名声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称她为“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⑫。但五口通商后上海的崛起，使宁波、乍浦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如开埠后头5年，宁波外贸额由50万元下降到此数的1/10弱^⑬。确实，“上海把一切东西都吸引它那儿去了，把

过多的进口货涌运到这里，同时还把原来准备到宁波的茶商吸引到它那儿去了”^⑭。19世纪60年代以后，“宁波的贸易几乎全部转移到上海，它本身的对外贸易额，在所有驻有领事的口岸中，是最少的一个”^⑮。

表 1-2 上海开埠初十年上海输出丝茶数及其在全国的比重

单位 丝 包 茶 磅

年份	生 丝				茶 叶			
	上海	广州	全国	沪占%	上海	广州	全国	沪占%
1843	—	1787	1787			17727750	17727750	
1844	—	2604	2604		1149000	69327500	70476500	2
1845	6433	6787	13220	48.7	3801000	76393000	80194000	5
1846	15192	3554	18745	81.0	12460000	71556000	84016000	15
1847	21176	1200	22376	94.6	12494000	64192500	76687500	15
1848	18134				15711000	60243000	75954000	21
1849	15237	1061	16298	93.5	18303000	64677500	82980500	22
1850	17245	4305	21548	80.0	22363000	55076400	77430400	29
1851	20631	2409	23040	89.5	36722500	62468100	99190600	37
1852	28076	3549	31625	88.7	57675000	36127100	93802100	61
1853	58319	4577	62896	92.7	69431000	31796000	101227000	69

资料来源 据丁日初等《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表2-6和表2-8改制。

商路的变化和外贸重心的转移，为浙江商帮崛起上海提供了历史机遇。大批浙商利用毗邻上海、与上海水陆交通便捷等有利条件，转移至沪经商创业，其中尤以宁、绍、杭、嘉、湖5府为主。碑刻资料记载，上海开埠后，宁波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⑯。方志资料也有“海通以来，挟土货与外人交易，或居间逐什一利，以宁波人居多”的记载^⑰；《四明公所大事记》说：“沪上自各国通商以来，万商辐辏，……吾乡之客

沪者日盛”^⑧。据人研究,至 19 世纪 50 年代初,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达 6 万人^⑨。上海开埠后,绍兴商人也竞相奔走经商于此。《浙绍永锡堂征信录》说:上海开埠后“巨舰星驰,众商云集,实都会之胜,而财利之藪,郡之人竞奔走焉”。又说“沪地自辟洋场,实为利藪,番舶商轮,星驰云集,而吾绍之人,于斯为盛”^⑩。上海小刀会起义前,浙绍公所曾在旅沪绍商中“设法劝立‘万名捐会’”,以助公所经费之不足^⑪。从中也可见当时旅沪绍兴商人之盛。上海开埠后,湖州人到上海经商的大为增加。民国《南浔志》这样写道:“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州,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日众”^⑫。

如果说上海开埠是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契机,那么,太平天国起义对浙江商帮崛起上海客观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这种“催化”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渠道,为浙江商帮崛起上海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太平天国起义打断了闽浙赣地区茶叶经广州外销的传统商路,使这项当时最主要的出门商品大部分改由经杭州或宁波至上海出口。1851 年广州出口茶叶 6246.8 万磅,上海出口 3672.3 万磅,上海只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 37%;但 1852 年转为广州 3612.7 万磅,上海 5767.5 万磅,上海占全国出口量的 61%,1853 年又升至 69%。(见表 1-2)这种变化为商计敏锐的浙江商人切入、扩大茶叶贸易创造了机遇。事实上,当时茶叶经山区运到宁波后,多掌握在宁波商人之手,外商只能待它运到上海,并经行帮准许才能得到^⑬。

二是太平天国起义促使大批浙江富户商贾移居上海,使旅沪浙江商帮力量大为增强。1860 年 2 月太平军主力李秀

成等部大举入浙后 浙省最富庶的杭、嘉、湖、宁、绍等地区相继被太平军占领，人们四处避难，其中许多避居上海租界。如太平军进军和占领绍兴期间，绍兴府“避兵来沪者，踵相接”^⑨。被称为上虞“冠族”的田氏家族诸家，在同治初年太平军进军绍兴期间，为衣食计纷纷“弃读就贾”，其中多就贾沪上，如田芑卿就“避地贸迁于上海”^⑩。至于宁波，在太平军进军杭州途中 外国报纸就预言：“倘若杭州真为叛军所攻占 那将有大批的人从宁波涌向上海”^⑪。事实确是如此，太平军占领宁波时，外国报纸又报道说，这里的“钱庄与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乡下”^⑫。太平军进军浙西地区时，当地殷实之家也纷纷避难上海租界。如后来被称为南浔“四象”之首的巨富刘镛，在 1860 年 6 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已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1862 年在上海恒源里购地建屋定居^⑬。“四象”之一的庞家也是如此。庞芸皋于太平军进攻湖州时与其父“避之上海”，并因此在上海经营丝业^⑭。后被称为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家，也于太平军进击南浔时转辗上海，赁住旧教场瞿姓“止园”^⑮。太平天国起义也迫使原贸迁苏州等长江下游地区的浙商向上海转移。据档案资料载 咸丰十年 1860 前，“经营杭绸者多云集在苏州”并设有钱江会馆，在上海的只有唐仁丰、夏顺昌 2 家，但同治初元上海已有 20 余家；而水客更多麇集”^⑯。可能，苏州的杭绸商在咸同年间因太平军进占苏锡常地区转移到了上海。当时避居上海租界的主要是地主官僚、绅士富商，也有一般贫民，许多人因此定居沪上。另有史料说，直到同治年间，“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⑰。其实，“逃难未回”是因为就此定居沪上。“逃难”沪上的浙江富户商贾 大多重操旧业 经营商业和钱庄等旧式金融业，并因此得以与外商接触，学习西方语言和

经营管理方法，为在上海创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刘大钧在《吴兴农村经济调查》中说“太平军进军湖州时‘，出产辑里丝之湖州人士，稍有资产者相率避居上海，因此得以与外人接触，渐通其语言，……肇日后贩丝致富之基’”^⑥。有的官宦地主汇入上海后，受了西方文化和上海商业氛围的影响，也加入了经商行列。避难上海的贫民，很多成为杂役、学徒、船员、店员、洗衣工、水木作业者和水手等^⑦，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沪上著名商人。

注 释：

今浙江省区范围和省内行政格局基本上是明初确定的。元代在杭州设江浙行中书省（简称江浙省）；两浙始以称省”。不过元代江浙省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及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明初置浙江承宣布政司，习惯上称浙江省。洪武十四年（1381）嘉兴、湖州从京师划入浙江，浙江省辖 11 府 76 县，其省境及府（后称市）县数量、辖区在此后 600 年间基本没有变化。

关于前近代时期的主要商路参考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36 页。

《浙江通志》（1736 年始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本，第 110 页。

徐明德：《论清代中国的东方明珠——浙江乍浦港》，《清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赣江——大庾岭商路开辟于秦汉时期，为连接江南、华南孔道，它由广州北出庾岭，入赣江过鄱阳湖接长江商路，或东经河口入钱塘江水运，接运河商路，是前近代最重要、最繁忙的商路。明人有“一逾梅岭，即浮长江，四通八达”之说。见胡宗宪：《筹海图编》卷 13，《广东船图说》。

⑥ 参阅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第 268—269 页，第 292—298 页，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

⑦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第 63 页，台湾永裕印刷厂 1985 年 5 月版。

⑧ 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前言。